

## ■新作聚焦

## 孙惠芬长篇小说《紫山》:

## 重建乡村精神秩序,激活乡土文明生机

□薛 冰

经过作家十余年的情感发酵和笔力酝酿,以非虚构作品《生死十日谈》中农村自杀案为原型的长篇小说《紫山》与读者见面。故事中遭遇背叛的自戕者、堂兄和妻子这两个为爱负罪的背德者,以及他们的精神跋涉和命运走向,成为《紫山》全书的结构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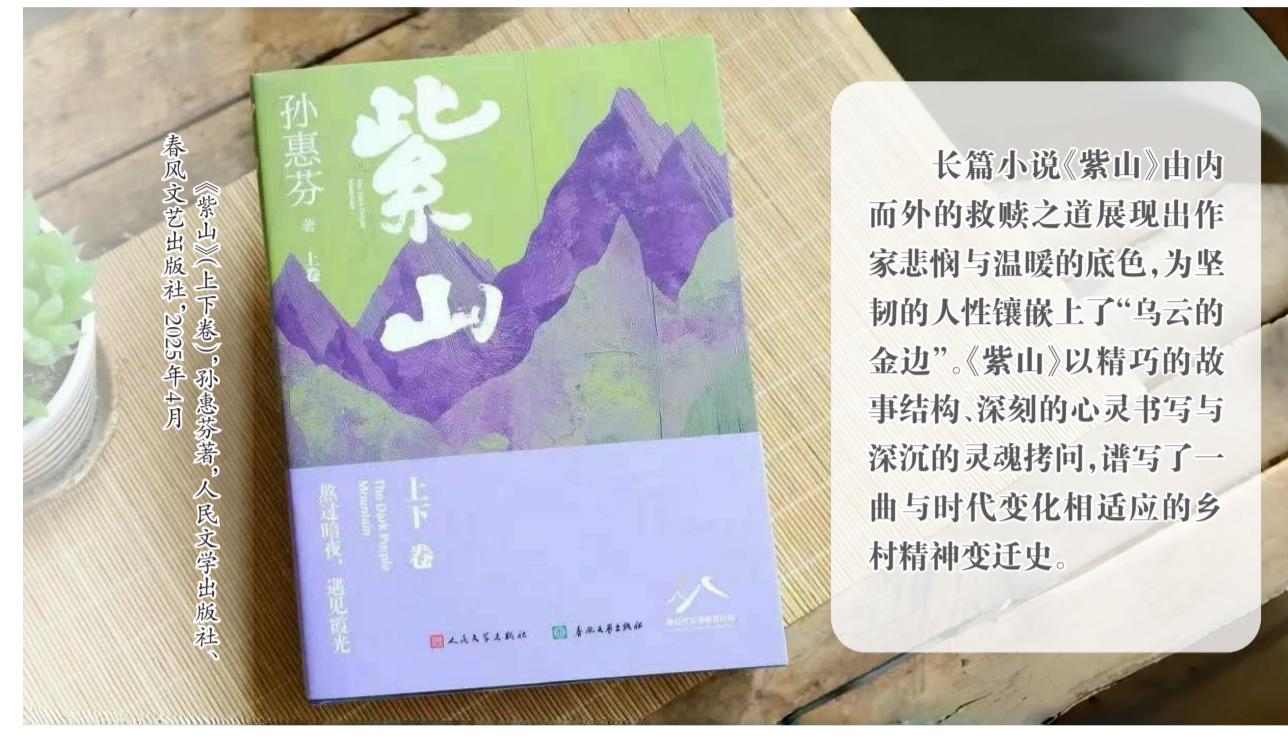
《紫山》上卷名为“三个人”,主要讲述汤立生服毒后,经医院治疗无效,从医院转回堂哥汤犁夫家,在妻子冷小环的陪伴下,等待死亡的降临。一个濒死者不解、愤怒与绝望,两个“杀人犯”的懊悔、挣扎与相惜,三个苦命人的悲楚身世和过往遭际,都被编织进作家的叙事网络中。下卷名为“两个人”,讲述汤立生离世后,汤犁夫和冷小环试图摆脱罪恶感,以主动性姿态投身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大潮,在各自的人生轨迹和命运抉择中安放心灵的故事。从表面上看,《紫山》叙写乡村现代化转型时期道德伦理观念造成的悲剧,实际上,通过这几个人的命运勾连出了人性与道德的辩难、乡村权力与精神秩序、宗族伦理,以及市场经济转型、乡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资源保护等更深层次的现实命题。通过《紫山》,孙惠芬再次贴身亲吻养育她的乡土大地,在城乡徘徊和漂泊的羁旅中,歌吟精神还乡的诗篇;也怀着巨大的悲悯,在人类的苦难命运中,探赜人心对于现实的对抗性力量,书写人类超越苦难和精神蝶变的心灵史;更在深情的心灵关怀中,守护乡土文明的传统根基,为乡土大地清唱一首安魂曲,并试图激活古老乡土的内在能量与灵光。

## 精神还乡的羁旅诗

精神还乡一直是孙惠芬小说创作的母题。在城市与乡村的裂谷间,从买子与月月(《歇马山庄》),到申吉宽与许妹娜(《吉宽的马车》),再到冷小环与汤犁夫,乡村人享受着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新奇体验与物质资源,也承受着文化差异与价值裂变带来的现实打击与精神伤痛。将《紫山》放置在孙惠芬小说的创作谱系中可以发现,它与此前作品保持着一脉相承的贯通性,又因其书写的深广度和完成度,而显示出对以往作品的集合性和超越性。

作为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孙惠芬深知乡土世界的情况,理解向往城市的梦想,却也恐惧被连根拔起的孤独与伤痛。因此在以往的写作中,人物往往挣扎在出走与返乡、开放与保守、疯狂与寂寞之间,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即便如《后上塘书》中刘立功那样的成功者,也在精神还乡的途中迷失了自我身份与道路方向,这种犹疑与迷茫直指人性中那些黑暗幽微的不可探查之物与精神迷障。还乡并不是物理和地理层面的身体重返和位移,而是直面自我、直面内心那些由欲望和情感交织成的暗影,以人性的力量勘破这些阴影迷雾所完成的形而上的精神求索——这个过程无疑是艰难而复杂的。

但人生如逆旅,踽踽复前行,《紫山》告诉我们的是,往往极致的苦难才能催生最牢不可破的人性力量,想要抵达安详的精神之乡,必须要“熬”至暗时刻带来的道德拷问与灵魂折磨。在等待死亡的三天和那间逼仄的乡村小屋的时空聚合点,作家通过大量细密扎实的心理独白与梦境叙事等意识流手法,为故事营造了一种沉重的氛围感。一波波来访村民行里的唾弃和责备,将他们进一步扯入由乡村伦理道德编织的大网中动弹不得。汤立生死后,生活的折磨并未消散反而愈加深刻,回到城里的冷小环义救好友却遭诬陷身陷囹圄,守乡的汤犁夫迷失方向不知所措。但不同于以往作品中的犹疑和踟蹰,《紫山》的主人公们坚定地选择“熬”下去,执着地追寻精神还乡。在这样的坚持下,小峪沟村民众志成城保下了矿山,冷小环实现了梦想在翁古城开办“杰瓦号”餐厅,在城市里为农民工们置下一处温暖的立足之地。借助《紫山》,孙惠芬在自己的写作序列中实现了一次精神还乡的闭环。



## 自我救赎的心灵史

正如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所言:“小说在探寻自我的过程中,不得不从看得见的行动世界中掉过头,去关注看不见的内心生活。”跨越那些细致展示乡村物质外壳的外在书写,《紫山》的写作直指内心,深植乡村人的精神现状与心灵成长,自内而外地形成了对救赎与超越等主题的升华。

小说中,“乡村能人”汤犁夫被赋予了多重意义。他曾是参与援助非洲的国际主义战士,哪怕回国拒绝公职后仍是小峪沟村手艺最好的木匠,受到村里人的尊敬和爱戴。但在伦理失范后,援非时害死队友推卸责任的过往,爱上弟媳后灼烧心扉的痛苦,遭受村民白眼压迫的创伤,都一股脑地袭来,让他深陷精神危机与灵魂颤音。发散的叙事触角在汤犁夫这一人物形象身上形成了聚合点,此后他展开了对自我心灵的救赎之旅。为救冷小环,他拿出全部积蓄悉心谋划,百般波折联系上她的亲生母亲展开营救;为救疯老婆冯玉环,他接到了蚕王养父断续多年的养蚕事业,为乡村经济发展开辟了新途径;为救小峪沟村,他除夕夜单枪匹马对峙官占魁,竭尽全力辅佐刘广大接任村干部,又带领村民们签下了抗议书,对抗企图霸占峨山的开发商……汤犁夫的自救是通过对他人、对故乡的爱与责任来完成的。不仅是他,冷小环开办餐厅是为了给农民工提供温暖,乌老道不惜背负因果“骗卦”是为了弥补对冷小环的父爱空缺,作为佛教徒的冷小环养母慕水云则是用付出、宽容和克制来换取内心的平和。由内而外的救赎之道展现出作家悲悯与温暖的底色,为坚韧的人性镶嵌上了“乌云的金边”。

不论是汤犁夫、冷小环,还是乌老道等老一辈的长者,苦熬只是他们完成自我救赎的外在形式,人间真情的牵绊和道德信念的坚守才是他们实现自我救赎的根本动力。小说中多次提及的蚕茧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它寓示了“不破不立”的质朴哲理,只有经历真正的心灵锤炼才能收获大彻大悟之后的淡然,只有“熬”过所有的苦痛才能破茧而出,方能在内在真我与外部现实的合力下,实现人物的自我蝶变与心灵救赎。故事的最后,冷小环活成了那个可以上房揭瓦的冷杰瓦,汤犁夫成为理想中的乡村匠人,他们用爱与悲悯遣散心中的阴霾,沐浴在紫色的云雾中,辗转腾挪。

长篇小说《紫山》由内而外的救赎之道展现出作家悲悯与温暖的底色,为坚韧的人性镶嵌上了“乌云的金边”。《紫山》以精巧的故事结构、深刻的心灵书写与深沉的灵魂拷问,谱写了一曲与时代变化相适应的乡村精神变迁史。

## 激活乡土文明的生机

紫山的现实原型是庄河北西部的老黑山,属于长白山系千山余脉,山体蕴藏了大连地区最古老的岩石和地层,与周遭平原的地层年龄最高相差数亿年。比对现实后,我们就更能理解汤犁夫、乌老道等人保护峨山的决心,因为他们保全下来的不仅是赖以生存的故土家园,更是亿万年时光留赠给现世的人间奇景。正如书中所言,守护这些奇景,是汤犁夫的使命,更是每一个小峪沟人民的使命。近年来,传统乡村因过度商业化开发而明珠蒙尘的例子屡见不鲜,但这难免有舍本逐末、买椟还珠之嫌。乡村文化是中华传统文明之根,传统村落更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宝贵“基因库”,但这样的乡村却大多正在经历荒芜与破败,逐渐在现实中消失成为了记忆中的故土。面对这样的现状,国家层面的政策调整与战略部署是乡村振兴与保护的核心保障,但同样重要的是重建乡村社会的精神秩序和信仰信念,激活古老乡土文明的生机。

《紫山》的故事原型脱胎于真实的农村自杀事件,在真实事件中,堂兄和弟媳很快结婚了,但他们发现那些看似隐秘坚韧的感情在生死、道德、伦理面前不堪一击,最终,道德倒下了,爱情也灰飞烟灭。在观察了解这样的现实后,在小说下卷中作者尝试选择了双线并轨的叙事形态,让冷小环出走城市,汤犁夫固守乡村,现实中的远离却没有让两个真诚热烈的灵魂熄灭,反而伴随着这种开放式书写,对乡村道德伦理困境的解困,转化为对社会伦理秩序的探索以及对文化伦理维度的解读。在城市与乡村的裂谷间,“杰瓦号”开张,养蚕事业重启,缫丝厂走向壮大,在汤犁夫、冷小环以及乌老道、刘广大等小峪沟村民的努力下,乡村逐渐建立起具有现代属性的新的发展秩序,被遮蔽的乡土精神也迎来复苏。《紫山》以精巧的故事结构、深刻的心灵书写与深沉的灵魂拷问,谱写了一曲与时代变化相适应的乡村精神变迁史。

(作者系辽宁文学院《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编辑)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LITERATURE SUMMIT PLAN FOR A NEW ERA

## ■短 评

## 命运的凝视

——评《雕像一般的眼睛》

□黄家忆

作为上海新生代作家,三三的创作在地域空间书写上表现出独特的艺术特点。新作《雕像一般的眼睛》跳出以往的书写经验,将笔触转向澳门,开拓新的审美空间。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历史遗留的殖民痕迹赋予了澳门这片土地神秘的风情。妈祖庙、天主教堂、葡萄牙人石像等文化符号为小说构建了一个具有历史厚重感的文化空间,也为故事营造出深沉的情感氛围。

小说以老渔民罗志伟的归乡之旅为主线。在阔别将近半个世纪后,罗志伟带着儿孙一家五口重返澳门。随着飞机的降落,澳门的面貌逐渐明晰,罗志伟的记忆也如同影片般开始回放。青年时代那些鲜明、刺激的出海经历,在时间的打磨下逐渐变得轻盈、虚浮,或转化为虚幻般的传奇。现实中的澳门早已今非昔比,过往的渔村逐渐被现代城市的面貌所掩盖,渔民的历史也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褪色。小说在回忆与现实的交织中展开,关于主人公为何放弃捕鱼、为何离开澳门,小说并未正面描绘几十年前那场改变主人公命运的海上风暴,而是在回忆中道出命运的冷峻:“爷爷做了很坏的事情”“错在自身,我接受一切惩罚”。这种忏悔言辞似乎指向了一种更高维度的道德审判。

小说在祖孙对话中揭示了渔民的宿命。“我们认为自己是大海的朋友,偎在它身旁生活,享受它的馈赠来活命。”罗志伟的渔民身份似乎注定了他一生都无法摆脱海洋的统治。与其说渔民对大海的掠夺最终导致了自我的反噬,不如说渔民本身始终属于大海。“黄花鱼的脑颅中有一对洁白而坚硬的大耳

石,控制着它们的听觉。”渔民如同黄花鱼,身上始终存在一对耳石,不论身处何地,都能听到大海的召唤。大海滋养他们的生命,又是他们最终归宿的港湾。最后,罗志伟感到“耳朵里的石头开始轻轻颤动”,与黄花鱼相似的感受预示着他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渔民和黄花鱼的生命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联动。

“雕像一般的眼睛”是贯穿全文的重要意象,出自葡萄牙女诗人索菲娅·安德雷森的《船》。在索菲娅的诗中,渔船不再是动态的、意气风发地在海洋中航行,而是静止的、沉睡的。小说不仅描绘了渔船的状态,更象征了渔民的宿命。这双冷峻的眼睛可以视为命运对罗志伟的凝视。渔船代表着渔民的生活与命运,罗志伟曾拥有着海上的生杀大权,然而最终也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对大海的掌控,逐渐像沉睡的渔船一般,在海滩边静默下来。大海作为重要的文学母题,往往象征着难以征服的、变幻莫测的神秘自然力量,人与大海之间常表现为相互依赖又相对对抗的关系。不同于《老人与海》中对人在自然面前力量与抗争的颂扬,《雕像一般的眼睛》提供了另一种关于人类处境的哲学思考。死亡可以是对命运的抗争,也可以是对命运的妥协与顺从,这体现了生命循环的不可逆性与时空的无常。

《雕像一般的眼睛》展现了独特的渔民文化与生命哲学。三三在文本中构筑了一个复杂的叙事空间,通过精妙的象征与对比,揭示了过去与当下、信仰与现实、生存与死亡的冲突与融合。她在叙事中展现出的对人类记忆、现实与命运的独特思考,赋予了作品深邃的思想内涵。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 ■新作快评

宋耀珍散文诗《红》,《诗刊》2025年第2期

## 人与信仰的传神书写

□王春林

既然被命名为散文诗,顾名思义,这一文体的根本性质就是诗歌和散文特点的交融。虽然既不分行,也不押韵,但如何以凝练的文字和短小的篇幅将创作主体内在的复杂意蕴捕捉并传达出来,应该是散文诗写作者的追求。怎样以最简洁的文字将不简单的意蕴铺展在纸上,是对散文诗写作者的最高审美要求。以这个标准来评价宋耀珍的散文诗《红》,可以视其为合乎文体标准且有所突破的优秀作品。

《红》别出心裁地抓住了“人”这一核心命题,以凝练的文字对长征精神进行书写。我以为,宋耀珍《红》的思想艺术集中体现三个方面。

首先是象征手法的精妙使用。《红》第一章中的“杉木,居于风暴中心”中对“杉木”进行了象征性书写。“狂风猛烈地抽打它挺拔的树干,撕扯它的枝叶和头发/寒风嘲讽它,想折断它握在手中的真理,想磨损它额头上的智慧和坚硬/甚至围殴它,驱逐它……”在描写肆虐风暴的同时,作家也在描摹杉木的特征,举凡“挺拔”“真理”“智慧和坚硬”,再加上“高度与姿势”“独立于大地”“怒发冲冠”等,都可以看作是对杉木特征的象征性书写。杉木被更进

一步喻为“风雪中的领袖”“火焰中的勇士”“镰刀与铁锤的儿子”,这些意象叠加在一起,是对虽处极端困难境地却依然坚守自身信仰的红色力量的形象化书写。杉木之所以能够在风暴中心昂然屹立,还与志同道合的战友紧密相关:“风暴中走过来一群战友,马尾松、榕树、毛竹、泡桐……和杉木站在一起”。杉木的坚持与最后的成功,也是因为得到了志同道合者的坚定拥护与强力支撑。

其次是叙事性的凸显。此前大多数散文诗都以抒情性见长,但《红》的特别之处在于不失抒情本色的同时,凸显并强化了作品的叙事性色彩。尽管作家在处理时的言辞非常简洁,但仍具备叙事特质。比如“把兵工厂扛在肩上,把石印机扛在肩上,把X光机、药品和大米扛在肩上,把文件、墨水、地图扛在背上……沉重的国家在崎岖的山路上”,具象性事物与“沉重的国家”这种抽象的表达结合在一起,传达出的是行走与赶路的艰难程度。若干叙事性镜头组合在一起,最终凝结成的便是遵义会议召开前种种力量集结的象征性书写。

第三是人物意象的勾勒与渲染。出现

人类的自我超越如何发生

□孙惠芬

## ■创作谈

《紫山》这部小说,源自一个真实故事的启发。那是2011年,我随大连医科大学贾树华教授做自杀遗族心理访谈时遇到的故事,一个在外打工的农民,从城里带回一个女子回家结婚,亲哥以他没有赡养老人为借口不让进家,厚道的堂哥收留了堂弟。结婚三个月,堂弟发现妻子和堂哥好上了,遂服毒自杀。故事骇人的地方在于,堂弟抢救无效,需要回家等死,可从医院拉回来,亲哥还是不让进家,认为堂哥是肇事者,堂弟必须回到堂哥家。堂弟在堂哥家又活了七天。村里人从不同角度讲述了这黑暗的七天。我听后非常震撼,无法想象那七天是怎样的时光。三个人,一个是遭遇背叛的濒死者,两个是深深爱着,却又因为爱而负罪的背叛者,他们经历了什么?如何面对?

这个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小屋,人性的光明与黑暗、道德与背叛、恐惧与罪恶,如何鞭打、审判着他们的灵魂?记得当时讲述者的口吻,无一不是对两个肇事者的声讨、诅咒和批判。或许就是那一刻,我萌生了将小黑屋的锁头打开的念头。这里面包含了最为普遍的人性,包含着爱、欲望、恐惧、孤独、罪恶,但在《生死十日谈》里,我只揭开了冰山一角。这些年来,他们一直跟着我,我的光却一直无法照亮他们——打开小黑屋,走进三个人深陷沼泽的情感纹理或许并不难,寻找将屋外的人隔开的壁垒或许也不难,难的是怎样才能将困顿的灵魂从小黑屋解放出来,让他们获得重生;如何把壁垒推倒,让同样痛苦的灵魂彼此相认——在那次访谈中,我平生第一次真实地看到,那些深陷灾难的人们,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没有一个不是接受了因与果的追问,那些一度沉沦的灵魂,没有一个不是在沉沦后获得了上升……

还记得,2020年一次活动上,评论家汪政曾问我写什么,当我说出不想写作了的时候,他毫不客气地说,“堕落!”一个作家不想写作了,确实是“堕落”。但我没想到,就是被棒喝“堕落”的那个晚上,“紫山”蹦了出来。那是2011年写下的一个小说题目,那时听说庄河北部山区有一座山,地下水常年轰鸣,山上雾气笼罩,有阳光的日子,不确定什么时辰,就变成了紫山。紫色,是超越的颜色,我又喜欢托马斯·曼的《魔山》、查尔斯·弗雷泽的《冷山》和爱丽丝·沃克的《紫色》,于是就望风摄影地为自己的下一部小说取名《紫山》。当时想到的超越,并非指笔下人物的超越,而是想通过暗示,激发自己创造力的超越。可事实是,我为这部小说下乡深入生活两年,最后写下的却是《生死十日谈》和《后上塘书》。这两部作品是否有所超越我并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在我的写作生涯中,从没荒废过一个题目,《紫山》是唯一一个。然而这个晚上,它不知为何就蹦出来了,它蹦出来,后边还跟出两个小题目:三个人,两个人。

这或许就是写作之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写作之谜。我本不想写作了,觉得生命中可以没有写作,可是灵感来了,就没什么道理好讲。

当《紫山》这个沉睡的题目被唤醒,像一束光,它不光照亮了小黑屋里的三个人,还照亮了如何从道德灾难中活下去、走出来的两个人,因为当小说有了上下部的结构,我突然想起黑格尔的话:“对伟大的悲剧人物来说,有罪是一种荣誉,沉重的负罪感使后来的和解成为可能。”

没有为了写悲剧而去寻觅,是我放不下的悲剧得到了激发。我并非自信能写出伟大的悲剧人物,但我对两个在灾难中负罪的灵魂如何和解充满了好奇。灵感照亮小说,但也只是小说的种子,如同思想的火花,需要将它植入大地,撒向能够燃烧的原野丛林。

我的大地,我的原野丛林,自然在我的故乡庄河,它离大连约180公里。一些年来,一直都觉得,180公里,是我与时代的距离。时代就在身边,它是小区外面的车声人流,是手机电视的新信息,它是身边无所不在的空气,可对我而言,只有回到乡村大地,见到田野中落雀一样的房屋,听到街巷里“妈呀你怎么来了”的乡音,时代的气息才扑面而来。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把自己放逐在故乡大地的沟沟岔岔,我仿佛掉进矿石,富得流油,当我再回到大连家里,写下“仅以此书献给我的辽南大地”,一部从人性的道德难题入手,探索人类精神超越如何发生的乡村小说呼之欲出。